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贺雄飞/主编



拒绝遗忘

钱理群文选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国防大学 2 069 3384 4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贺雄飞 / 主编

钱理群 文选

汕头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钱理群著
—汕头：汕头大学出版社，1999.5
“草原部落”知识分子文存·贺雄飞主编
ISBN 7—81036—332—8/Z·36

I. 钱…

II. 钱…

III. 钱理群—文选—思想史

IV. 24

钱理群文选——拒绝遗忘

总体策划：草原部落创作室

责任编辑：张惠民

出版发行：汕头大学出版社

(广东省汕头市汕头大学内)

印刷：固安印刷厂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5.5

字数：421千

版次：1999年5月第1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7—81036—332—8/Z·36

定价：23.80元

606 23/62

自

序

自序

坦白地说，对这本书的编选，我是踌躇再三的：这几年我的书出得不少，今年还会出好几本，现在又拿出这个“选本”，会不会增加愿读我的文字的读者的负担呢？朋友们却这样说服我：此书是给并不了解你的读者看的：难道你不愿意有更多的读者听到你的声音吗？这倒也对，写文章又公开发表了，当然是希望有人读，而且读的人越多越好的，这本《文选》就这么编出来了。但我并没有因此而获得轻松：当要求我写篇“序言”时，竟久久交不出卷，不仅是因为忙（我是以此为理由一推再推的），更是由这本书的编选引发出许多自我的反省，一时竟是理不清楚了，即使是此刻坐在电脑前，也不知从何说起。而交稿的期限已近，又不得不勉力写几句，那怕只是开一个头——我真的如一些朋友所说，成了写作的“机器”与“奴隶”了。

径直说，面对这一大堆选出来的文字，也可以说是自我生命的结晶吧，不能不给自己提出这样一系列的问题：你写了什么？你写的这些东西有什么意思？又可能存在什么“陷阱”？你在能写什么的同时，又不能写什么？这“不能”显示了你的自我的一种什么样的“界限”（或者“局限”）？你还能写下去吗？你准备怎样继续写下去？……如此等等。要回答这些问题，就必须对自己进行一番刨根式的清理。或者就从“我”的成长背景这一点切入（谈起）吧。这本也是我多次谈到过的：作为五六十年代接受

小学与大学教育的知识分子，我是在“批判封、资、修”的人文环境中长大的，这就决定了我的知识结构存在着某些先天性的缺陷，例如不懂外语，对20世纪西方文化的完全隔绝，对中国之外的东方文化的隔膜，以及中国古代文化修养的不足，并由此造成的思维与视野等等方面的种种局限，但我也有自己的优势，这就是一生目睹与经历了太多的苦难，套用年轻时最喜欢引用的阿·托尔斯泰《苦难的历程》扉页里的那句名言，可以说是在“血水里浴（过）”“碱水里煮（过）”，是与自己的民族、人民共同煎熬过的。因此，对中国的国情、民性、人心，有着较为深切的观察，积累了丰富的的人生经验，也有着同样丰富的生命的体验。正是这些“丰富的痛苦”帮助我逐渐接近与认识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新文化，并且化作了自己的血肉。前几天我还和大学的一位同学谈到这一点：20世纪中国有了鲁迅，这真是我们民族的大幸，对于我这一辈的知识分子更是如果没有鲁迅精神的支撑，几乎就失去了安身立命的基础，尽管不断有人说什么“对鲁迅讲得太多，太过头”，宣布要将鲁迅“送进博物馆”，使其成为与现实无关的“古董”，甚至批判与否定鲁迅：我仍然固执地认为，我们至今对鲁迅对我们这个民族的意义，对未来中国发展的潜在价值，还是认识得不够，现在不是“讲得太多”，而是要求“讲得更深入”，更不能将鲁迅“送进博物馆”，而要进一步在知识分子与全民族中发扬鲁迅精神传统。我也正是在这里找到了自己的生命与学术，写作的基本立足点，可以这样说：20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具体地说，我的关注、思考与研究主要是四大块：一是对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二是对知识分子（首先是对自我）的弱点的反省与批判，三是对本世纪思想文化发展的历史经验教训的反省与总结，最近几年又涉及鲁迅对“现代性”问

题的思考与“现代性”目标的确立等为现实生活所激发的新问题，四是对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寻踪，精神谱系的续接。——这就是我想写、能写，并且已经写了的：这大概也构成了本书的主要内容，读者自可去看文章，就不必多说了。

要说的是我的“讲说”的局限与可能存在的陷阱。前述先天的不足，知识结构的缺陷，使得我对鲁迅的“讲”与“接着说”在深度与广度上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并难免出现误读与盲点，这都是一眼就可以看出的：坦白地说，我对此感到十分的痛苦与无奈，正因为如此，看到一切比我更深刻、更富有创造力的讲说，我都会感到极大的欣慰，尽管也不免暗含着几分嫉妒与对自己无能、无力的沮丧，但我仍从中吸取，丰富自己，为此而暗暗感激这些我的同行，并期待着有更多的给我以刺激与启示的后来者。而对我自身的讲说，特别是这些讲说在学生与读者中产生了一定影响，我是一则以喜有了回响，说明自己的工作于已于人都有点意义，自然是高兴的；但又不能不继之以忧会不会因为我讲得不准确，或者不清楚，而造成某种误解，以至曲解呢？会不会再度出现世纪思想史中曾经发生过的“从这间屋子走进，却从那间屋子走出来”的悲喜剧呢？记得鲁迅当年对他说的话（“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就曾“附加几句话以免误解”：“我之所谓生存，并不是苟活；所谓温饱，并不是奢侈；所谓发展，也不是放纵”（《北京通信》）；那么，对我自己的讲说，是否也应该“附加几句话”呢？大概是有必要的吧。比如说，批判历史与现实的“国民性的弱点”，不能因此而导致对民众的蔑视、恐惧与排斥；同样，对知识分子弱点的批判，也绝不能引向对知识分子与知识的贬抑与否定。以上两种倾向在本世纪都曾出现过，但是被鲁迅所明确拒绝与批判的：在鲁迅看来，“觉悟的智识者”是既“不看轻自己，以为是大家的戏子，也不看轻别人，当作自己的喽罗”的（《门外文谈》）。而今天似乎也还有这样两

种立场或倾向，却也都是我所不能接受的。更重要的是，当我们在检讨本世纪历史中的许多弊端时，不能忘记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无论是普通国民，还是知识分子，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处于被奴役、压迫的境地，尽管他们自身的弱点，特别是根深蒂固的奴性，成为了强权统治的社会基础，但“奴隶”与“主子”、“奴才”的区别却是不可混淆的（至于“奴”与“主”之间的转化是另一个问题）；因此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目的是要启发民众自己觉悟，反抗压迫与压迫者。鲁迅是把自己的批判锋芒最终引向奴役者与奴役制度本身的，并因此对任何有可能（无论有意还是无意）帮助压迫者逃脱罪责的言行保持着高度的警惕，他尖锐地指出：“倘使对于黑暗的主力，不置一辞，不发一矢，而但向‘弱者’唠叨不已，则纵使如何义形于色，我也不能不说——我真也忍不住了，他其实是杀人的帮凶而已”（《论秦理斋夫人事》）。鲁迅还向人们发出过这样的警告：以为“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卸责于清流或舆论”，这是“古已有之”的老调子（《1934年4月30日致曹聚仁书》），这个传统我们今天是万万不能继承的。这里，也还有一个在进行国民性弱点与知识分子劣根性的批判时，将自身置于什么位置的问题，这涉及我们对所说的“鲁迅式的精神界战士”的理解与认识。鲁迅指出：“他只是大众中的一个人，我想，这才可以做大众的事业”（《门外文谈》）。这就是说，这种批判，不是高居于众人之外、之上的“审判”，而是把自己也摆进去的，因此鲁迅说，我无情地批判别人，更是无情地批判自己的。当然，由于思想的超前，或者如鲁迅说的比别人更敏感，看得更透，精神界战士身居于大众之中，也会有—种孤独感、寂寞感与绝望感。但首先这是一种建立在对国家、民族、大众、他人、以至人类、世界、宇宙的“大关怀，大悲悯”基础上的“大孤独、大寂寞、大绝望”，而绝不是对“—己的悲欢”的感伤的“咀嚼”，那只能显示自我

精神之“小”。于是，在感受着孤独、寂寞与绝望的同时，又怀疑于这样的孤独、寂寞与绝望，并努力地“反抗绝望（孤独与寂寞）”，在任何时候都不放弃对“同道者”的寻求，病态的“孤芳自赏”正是鲁迅和一切真正的精神界战士所深恶痛绝的。因此，如许广平所说，他们虽则“自己所感觉的是黑暗居多，而对于青年，却处处给予一种不退走，不悲观，不绝望的诱导，自己也仍以悲观作不悲观，以无可为为可为，向前的走去”（《两地书·五》），终日愁眉苦脸、呼天抢地的，是鲁迅批评的“零余者”，而绝非精神界的战士。真正的精神界战士确实在尖锐地批判着、反省着国民性与知识分子的弱点，但人们可以从中感受到一种对人的爱与宽厚之心，他们绝不以道德与真理的“化身”自居，作苛刻的道德与政治的判决，在这方面，精神界战士可以说是历史与现实中的“道学家”的天敌。以上所说，都是在划清界限。这不仅会有助于识别真、假精神界战士——当今社会假冒伪劣充斥一切，思想文化界也不例外，保持这样的警惕与识别力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对我们自身也是一个警戒：任何追求都有一条“线”，过了“线”就会走向反面。再往下就要讲“我不能说什么”了。我一直以鲁迅的一段话提醒自己：“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社会上崇敬名人，于是以为名人的话就是名言，却忘记了他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名人被崇敬所诱惑，也忘记了自己之所以得名是那一种学问或事业，渐以为一切无不胜人，无所不谈，于是乎就倨起来了”（《名人与名言》）。这些年写了点文章，知之者多了起来，就经常接到电话或收到来信要求就专业之外的问题发表意见或写文章，每回我都感到十分惶惑与紧张。我知道自己吃了几碗“干饭”，在专业范围内——鲁迅，周作人，以及现代文学，大概是可以发表点意见的，说起话来大体上是有把握的，除此之外，就谈不上什么了——老伴经常说我的“平均智商”在中下等水平是

有道理的。当然，对专业之外的有些问题我也有兴趣，不免也会发表些意见，但大都是在朋友之间私下胡说乱侃，上不了“台盘”，有时也会写成文章，那是作为一个普通人谈谈自己的看法，而不是以专家的身份发言——本书中有不少文章就是这么写成的。我也会不断扩大自己的研究范围，以增加发言权，但那也是要在取得了一定的研究成果之后。前面已经坦白交代，我能做的事是“讲鲁迅（或者再加上现代文学）”与“接着往下说”，这构成了作为教师与学者的钱理群的一种存在价值，同时也就划定了一条线。读者们看我收入本书或未收入的文章，不难发现，我几乎在发表所有的意见的时候，都是从鲁迅（或现代文学）出发的，很少在此之外去旁征博引，我知道那样做了就会“露馅”，这或许也可以说是一种“扬长避短”的写作策略。这既构成了我的说话、写作的特色，也显示了一种局限，因此，对当今中国社会，特别是思想文化上的种种问题，我只能就某些方面而发表看法，而且因为充分利用了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的精神资源，而引起了一些读者与朋友的注意；但在更多的场合与更多的问题上，包括许多争论的热点话题，我都是沉默的，当然，也有的是有想法而不愿卷入。而且，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世纪之交，中国与世界所面临的问题，无论是社会问题，还是思想文化学术的问题，都越来越复杂，提出了许多前沿性的课题，我越来越发现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了。——如前所说，我坚信，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思想文化资源仍然具有尚待开掘的潜力，我因此还有事可做；但另一方面，也必须看到，面对先驱者们未曾遇到的许多新的问题，只是“接着往下说”已经不够了，这是需要新的突破与新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我的“力不从心”就在于此。我这些年，一直把希望寄托于更年轻的一代的新的开创，就是出于对自己（或许还有我们这一代的学者）的某种难于突破的局限的一种估计。这种估计，对我来说，不会因此引出悲观与无所作

为的结论：我还有许多要做、可以做，而且别人（包括年轻一代）未必能做的事，这些事对中国未来的发展，也许并非那么重要，那么迫切，却也还是有意义，有价值的。我在十多年前，开始独立的研究，发出自己的声音时，曾在《心灵的探寻》的“前言”里，对自我研究的追求做过这样描述：“它既自尊，清楚自己的价值，又自重，绝不以否定或攀援别一种研究道路来换取对自己的肯定。那种‘肯定’实际是对自己的辱没。它更公开宣布自己的不足，因此也就为自己取得了一种开放的态势。人们不但可以从这样的研究中得到启示，而且可以从其不足之处开始，进行新的更富有创造性的开拓。其研究的生命力恰恰也在于此。”现在，在我回顾这些年风风雨雨中所走过的道路，并走上人生与学术的最后历程之时，仍然坚持着这样的追求，要说的也还是这些话。

1999年2月12日写毕于燕北园

目 录

第一辑/世纪思想遗产

-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3]
《野草》里的哲学 [15]
周氏兄弟与北大精神 [33]
说“食人” [58]
谈“做梦” [71]
论“演戏” [83]
析“主与奴” [105]

第二辑/知识者的心路历程

- 知识者与文学“被改造”的标本
——曹禺戏剧生命的流程 [133]

丰富的痛苦	
——哈姆雷特与唐吉珂德的东移	[160]
“流亡者文学”的心理指归	
——抗战时期知识分子精神史的一个侧面	
.....	[188]
“挣扎”的意义	[211]
我与鲁迅	[224]
有缺憾的价值	[238]

第三辑/精神死亡的大悲剧

精神界战士的大悲剧	[251]
真的人和真的杂文	[256]
中国知识者“想”、“说”、“写”的困惑	
.....	[262]
“帮忙”、“帮闲”的陷阱.....	[275]
反思三题	[278]
由历史引出的隐忧	[285]
青春是可怕的	[290]
“遗忘”背后的历史观与伦理观	[293]
(附录)中国现代农学界的先驱	[299]
绝对不能让步	[321]

关于民族主义思潮的访谈录	[327]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335]
想起七十六年前的纪念	[344]
百年光荣与耻辱	[352]
我看九十年代北大学生	[364]
读文有感	[367]
语文教育的弊端及其背后的教育理念	[380]

第四辑/寻找“精神界战士”

世纪末的心灵相遇	[403]
思考在继续	[408]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419]
“跨越了精神死亡峡谷”的自由歌唱	[433]
民间思想的坚守	[438]
回顾八十年代	[446]
“精神界战士”谱系的自觉承续	[457]
带着血蒸气的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	[465]
附录:钱理群著作目录	[470]

第
一
辑

世纪思想遗产

——北京大学演讲录



鲁迅与二十世纪中国

〔前记〕此文原发表于《北京文学》，不在“北大演讲录”之列。但因其可以提挈全部演讲的内容，故也收入本辑，并置首篇。

这是《北京文学》编辑朋友给我出的题目，自然是一个难题。我却几乎没有多少犹豫就接受了下来，这是因为我在这个题目下确实有话要说。

我为什么会想到这个问题？或者说，是什么样的思路，引发我想与朋友们讨论这个问题？诱因大概有二：一是现在已是世纪末了，好事者就不免想对即将过去的这个世纪作一番回顾与总结。记得鲁迅曾说过：“历史结账，不能像数学一般精密，写下许多小数，却只能学粗人算账的四舍五入法门，记一笔整数”。如此说来，在20世纪大舞台上风云一时的许多人物，连同他们的种种高论，大概都要在这历史的“结账”里被忽略不计，这是无可奈何的；但同时，也必定有一些人（及其思想）是要记入这历史的“总数”里的，而其中的极少数人则会在这“总数”里显现出特殊的光彩，从而在这世纪历史上，打上个人的烙印。在我看来，鲁迅即是这极少数人中的一个。我曾经说过这样的也许有些极端的话：在20世纪中国，有着自己的独立思想创造，可以以其名字命名，即称之为“某某思想”的思想家并不多，孙中山、毛泽东之外，大概就是鲁迅。他们三位可以说是对本世纪的中国历史，民族精神（思想，性格，心理，等等）有着最深刻影

响的历史人物，人们可以对这种影响，作出完全不同的评价（价值判断），但却无法否认这种影响的巨大、深远，与无可回避：人们无论在总结 20 世纪的中国的历史经验教训，还是在展望 21 世纪的中国历史与精神走向时，都不能绕开他们的思想与实践活动的影响；所以我说，这是一份“世纪中国遗产”，是必须正视而不容掉以轻心的。仅此一点，鲁迅对 20 世纪中国的意义，就是非同寻常的了——尽管不同于孙中山、毛泽东对整个中国历史进程的影响，鲁迅的影响主要集中于民族精神、文化的层面。

这就说到了中国的民族文化。这些年来，我们有一种流行的说法，叫做“弘扬民族文化传统”，这大概是不会有多少人反对的。但对“民族文化传统”的内涵、外延的理解，却存在着种种分歧，这大概也是无须回避的事实。在我看来，分歧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要“弘扬”的“民族文化传统”，究竟仅是（或主要是）“儒家”这一家，还是包括儒、道、佛、墨、法……多元、多家文化？其次，“民族文化传统”是仅仅限于古代文化传统，还是应该同时包括“现代民族文化传统”？——从上一世纪末到本世纪末这一百多年以来，经过无数志士仁人艰苦卓绝的努力，不仅已经产生了“现代民族文化”，而且已经形成了新的“传统”，对这样的事实存在，是不能视而不见的。当然，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也是多元的；鲁迅作为这样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杰出代表，自然就有着不容忽视的意义与价值，对这一点，人们大概不会有什么异议。——在具体评价上的分歧自然也是存在的；比如就自己的学术观点而言，我就认为，应该把鲁迅的传统看作是本世纪所形成的现代民族文化传统的集中代表，同时它并不排斥其它传统的存在与价值。在这里，我还想强调一点，这些年，我们在回顾、审视现代民族文化时，比较着重它的不足、缺憾的方面，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现代民族文化对现代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现实的生存环境，我们就自然要偏向于对它的种种不满与批判。但它的积极意义与价值，却是一个客观存在，也是不容忽视的。特别是在作世纪总结时，就更感到它的不易与可贵。鲁迅说过，“人类的血战前行的历史，正如煤的形